

# 市场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念变化

董志凯

本文通过回顾近现代市场经济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四次较快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变化,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兴起与“进化论”等西方思想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传播;50年代前期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恢复和发展与“双百方针”的提出;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拓展与“推陈出新”中的矛盾和冲突,说明思想文化的选择和扬弃在经济社会变迁、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董志凯,女,194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商品和市场,可以追溯到商周。傅筑夫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史的论述指出,距今两千余年前的西汉朝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与之相伴随,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在当时世界名列前茅。<sup>①</sup>然而,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两千年前中国的商品和市场与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商品和市场经济无论在规模和范围,广度和深度,还是在运行机制和交换方式,从而在作用和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近现代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出售剩余产品的处于补充地位的经济方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经济方式;它不仅是随机的、个别的、孤立的交换,而是走向规范化、秩序化、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它的经营范围已经涉及全国、面向世界;它的经济组织和运行已经并不断采用科学的、现代化的手段。这种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与中西文化交融并行的。

近现代的市场经济本来是一种根据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和调控能力与手段也有所变化和提 高,形成了适合各自国情的经济思想与文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出现了三百余年以后,依靠鸦片战争的炮舰强行进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腐败没落的封建帝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必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激烈地碰撞和冲突,对于此间的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以往作一简单的回顾,以说明思想文化的选择和扬弃在经济社会变迁、东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 一、传统文化观念与市场经济下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以来,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体系丰

<sup>①</sup>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富多彩,影响最大的来源为两个: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为主流;另一个是外来文化,其中以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为主流。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与经济发展联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经济学家戴元晨、宋光茂指出,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传统儒家文化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2. 以“义”为基准的义与利的选择,即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3. 以诚信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把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准则运用到朋友关系上,运用到为人处世关系上,就具体化为“信”。<sup>①</sup>

而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以下几个价值观念的基本原则:1. “自由”。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市场交换的基础,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只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个人从对社会的依附中解放出来;2. “平等”。在货币面前,封闭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开放的身分制的相对“平等”所代替;3. 竞争、效率。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杠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经济通行的法则;4. 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生产方式的不断创新,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是市场文明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地方;5. 开放。对货币的追求不受使用价值的限制,因而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6. 理性。如此,人们开始摆脱对传统、宗教和各种教条的盲目崇拜及迷信,用科学和实践作为认识事物的基础。<sup>②</sup>

东西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主要作用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依托是封建专制统治,在平等、竞争、创新、法制等方面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不合拍的;但是儒家“仁文化”强调道德自律,强调独立人格,主张诚实有信,提倡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群体凝聚的精神等,对于建立市场经济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这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都得到了实践和证明。西方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以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货币是联系的纽带,是衡量事物价值的尺度,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基本价值关系基础之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给自足观念,用货币本位代替了权力本位,用开放代替了封闭,用效率代替了停滞,用变化代替了守旧,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精神,而是利己心、竞争和对财富的贪欲。

## 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兴起 与“进化论”等西方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虽然早于鸦片战争前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基本上还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的。根据吴承明先生的研究,1895—1913 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 19 年间,新开设的本国资本在 1 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 549 家,资本额共达 12029.7 万元,平均每年增设 28.9 家,新设资本 633.1 万元。一些主要行业的增长速度,年率达 15—20%,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谓“黄金时代”。此间,官办企业的新投资 2013.2 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达 10016.5 万元。从这个时候起,民间投资首次超过了政府的投资,逐渐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

<sup>①</sup> 参见:《对传统文化的‘剔’与‘踢’》,《哲学研究》1994 年第 3 期。

<sup>②</sup> 参见张宇:《市场经济与价值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体之一。<sup>①</sup>这个时期也是进口工业品迅速增长的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和农村市场扩大的速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更远远落后于进口工业品增长的速度。出现了不合理的商品结构、市场区域结构和价格结构。

正是在上述经济社会背景之下,特别是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日本明治维新不过30年就打败了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严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人,都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世纪末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眼界,使他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认识自然和社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学习和传播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他们对进化论思想进行取舍、加工和改造,并以此为武器,论证国家的独立、自强和发展。章太炎则通过对进化论的研究和宣传,进一步发展到主张通过革命促进社会进化。孙中山十分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把进化论和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在社会的进化中,革命的突变是不可避免的。

在学习西方思想的热潮中,中国的思想家发生了分化,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体制的改良或革命,清朝官方的洋务派思想家却反对体制的根本性变化。近代洋务派思想家的代表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旧学即中学是根本,而西学即近代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只在于“应世事”。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西方进化论的传播,“物竞天择”的平等、竞争、变化的价值观念成为改良、维新,直至发动辛亥革命的思想武器。

### 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传播

1919—1936年,即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是中国资本主义范围扩大的时期,或资本主义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本国工业资本增长1倍以上,合年率6%,增长的主要是民族资本。1935年末,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物价上升,资本主义经济活跃。1936年可视为民族资本增长的高峰。在交通运输方面,出现了第二次铁路建设高潮,航运也有发展,并开始公路和航空运输,投资增长较快。同时,外国产业资本增长的速度约比本国资本大一倍。到了1936年,外国资本大体已控制了中国的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在纺织工业中,外国资本也占有纱锭数的46%和织布机数的56%;东北已成为完全的殖民地经济,关内经济的殖民地性也加强了。国民党官僚资本通过与帝国主义的交易步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垄断了国家的金融,通过货币、信用和外汇政策,可以掌握民族工商业的命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已经不存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伴随资本主义化而进一步发展,并带有上述产业的特点。<sup>②</sup>

在如此资本主义化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中的旧礼教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对人们长期奉为圭臬的“三纲五常”提出了挑战,倡导了个性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代表人物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他们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

<sup>①</sup>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sup>②</sup>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0—133页。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他们的研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活跃起来,形成了中国30年代思想观念、理论的大论战。毛泽东则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盲目崇拜书本的教条主义。1937年7、8月间,他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对于知行统一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作了生动的阐述。他在二、三十年代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等革命论述,强调了社会、阶级和集体的整体价值观念。他从中国近百年来国家被侵略、人民受奴役的历史出发,将阶级的解放、社会的发展作为个性解放的前提;并且提出和初步实践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

#### 四、50年代前期城乡交流、国内交流的恢复发展与“双百方针”的提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国家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经济、社会方针,促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也随之活跃和发展起来。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28亿元发展到1953年的131.09亿元,四年之中增长了一倍;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由1949年的2.2亿元增加到1955年的71.88亿元;个体和集体农业的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583亿元;国营工业的产值(包括部分中外合资企业的产值)由1949年的36.8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383.8亿元。<sup>①</sup>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市场的迅速稳定和繁荣,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和提高,使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凯歌行进的时期”,亦是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方针以前,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顶峰。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都呈现了比较活跃的状态。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期间,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发表了几篇论述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章,被中共中央责令检查。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修改稿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同年9月,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主张将黄炎培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的提法,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sup>②</sup>在上述指导思想和新中国一派生机勃勃的环境中,思想理论界非常活跃。尽管这一时期也有某种程度的把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而进行过火批判的不谐和之音,但总的来看,思想界都普遍怀有新生的感觉,热情焕发地努力工作。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主张让人们发表意见,提倡平等地争论、议论、辩论,通过说服和以理服人,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当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sup>③</sup>这说明他当时在哲学上仍然坚持了主张发展和变化、对立统一

<sup>①</sup>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本。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3—444页。

<sup>③</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4页。

的唯物辩证史观。然而,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成分的单一化,要求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加之错误地估计 1957 年一时激化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上述正确的方针未能贯彻下去。

## 五、8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拓展 与“推陈出新”中的矛盾和冲突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出现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组。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决定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分化和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种种观念、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等等相互混杂、缠绕。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甚晚,缺乏实践。据考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争”中提出的“兰格模式”,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突破,直接和间接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渊源之一,初步解决了市场竞争与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与按劳分配相兼容的重大理论课题。<sup>①</sup>兰格的探讨至今时间虽然不长,但也经过了半个世纪。遗憾在于,在中国于 1993 年又明确地提出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进行过种种改革,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在体制上试图解决市场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问题。中共中央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陈云于 1956 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曾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施“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模式。其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提出了带有创见性的见解,并得到了“八大”的认可。但是这种见解迅即受到“反右”和“大跃进”的冲击而没有实施。没有实践的理论得不到检验,也难以完满。以至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在实践上面临的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经济理论和价值观念、文化建设等方面,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在十余年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为了推进改革,强调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增添了无限的活力,使这些成分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到将近 10% 的比重,并且还在继续有所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现象。譬如,收入差距扩大在某些方面已经很突出。如个人收入悬殊,少则十几、几十倍,多则几百几千倍;地区收入差别最富的省份与最穷省份比较人均 GNP 最大相差 6—8 倍;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又开始加大。1979 年城乡居民生活费对比系数为 1 : 0.42,1985 年为 1 : 0.52,1991 年为 1 : 0.43。目前,国内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已不乏其人,百万富翁过百万,然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刚达到温饱,尚有 8000 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又如,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1989—1990 年间出现巨大的经济波动,物价飞涨;1993 年以来经济高温与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乱集资、乱拆借等经济秩序的混乱缠绕在一起等等。<sup>②</sup>

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使价值观念的建设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促进观念更新,又要在更新过程中加以选择。

<sup>①</sup> 参见罗卫东、蒋自强:《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月刊》1994 年第 5 期。

<sup>②</sup> 参见国务院研究室丁宝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经济研究参考》1994 年第 104 期。

## 六、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的展望

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价值的涵义越来越广泛了。它不仅仅体现为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求,而且体现为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它也不仅仅体现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精神需求,而且包含了追求优异的特性,即要求物质产品的技术先进、质量精良,精神产品的真(揭示或者宣传了科学和真理)、善(有益于社会的安定和进步)、美(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的欣赏价值)等等。不同的学科和学者,对于价值关注的角度也不同。经济学者注重价值的创造、实现、分配与再创造;哲学关注的是价值观念中的义与利、理与欲、德与力的关系变化;社会学者关注的是个人、家庭、群体、阶层对价值观念的差异和认同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建立,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努力。

价值观念是经济基础的产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历史性潮流。于是成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第四次市场经济活跃时期。它的特点是国家主权独立,党政积极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努力,思想意识形态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些特点带来的发展前景,从目前的现实预测似乎有一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这一次市场经济活跃延续持久,经济增长迅速稳定,人们将充分享受增长带来的繁荣,适应国际社会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的活跃发展,人们也看到了市场的局限:不仅有经济学家早已注视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诸如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市场对于宏观总量难以确定和控制,市场有产生垄断的倾向,市场难以避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而且有我国国情之下的特殊反映,诸如不能自发消除人口压力,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有限,难以自发整治政治及文化冲突等。<sup>①</sup>此外,还看到了腐败蔓延,国家失控;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劳资矛盾,贫富分化;文化素质堪忧;生态危机加重。<sup>②</sup>被社会主义批判了一个半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病在几年之内都突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经济增长难道非要付出如此之大的社会成本吗?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的老路,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三、四百年,有了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需要在实践中创造。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变迁形成的双重价值取向,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和工作的强度。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和投资于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和加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探索,以汲取人类创造的全部智慧财富,从中加以选择和扬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路来,实现个人、集体、国家、社会等各方面利益的矛盾在发展中不断以较小的代价取得统一的价值理想。

1994.8.10 初稿

9.12 二稿

责任编辑:张宛丽

<sup>①</sup> 参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四期。

<sup>②</sup> 杨帆:《中国发展前景预测》,《新华文摘》1994年第六期。